

張人駿考略

河北省博物館◎編

河北美術出版社



晚清重臣

張人駿考略

河北省博物館◎編

河北美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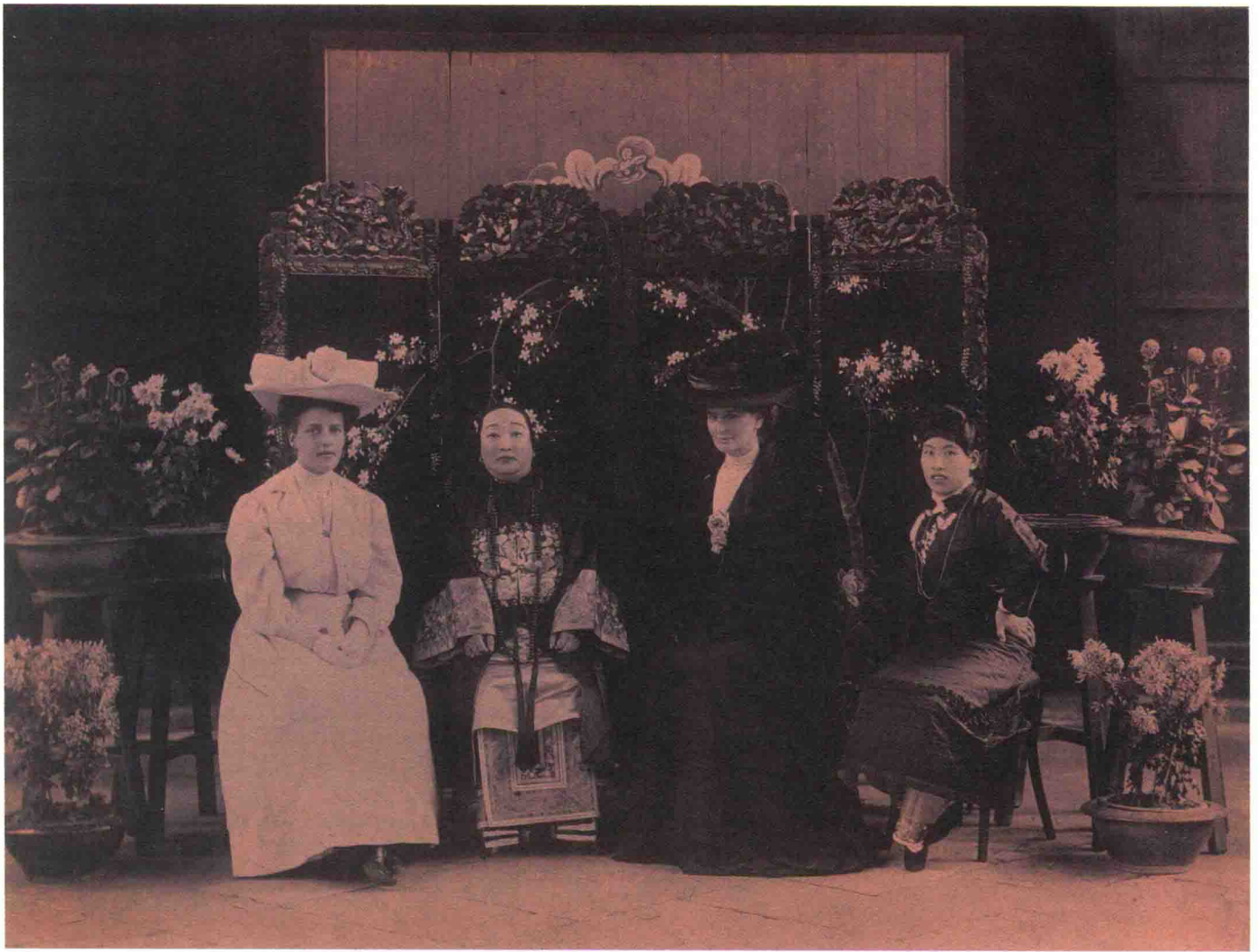
張人駿（一八四六——一九二七年）



張人駿（前排右起第九）一九〇三年在廣東巡撫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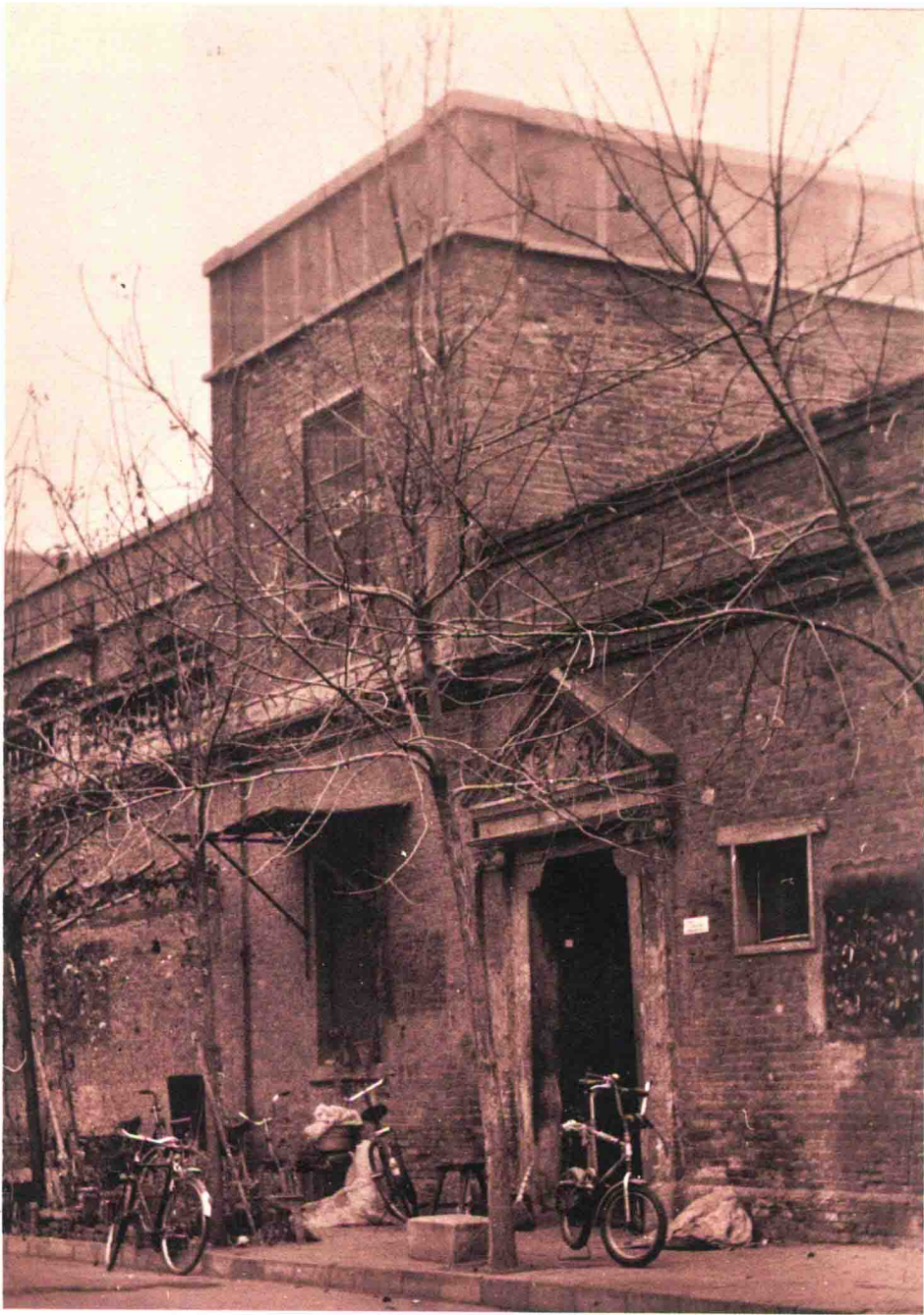
張人駿（前排中）與廣東高等學堂豫科畢業學員合影（一九〇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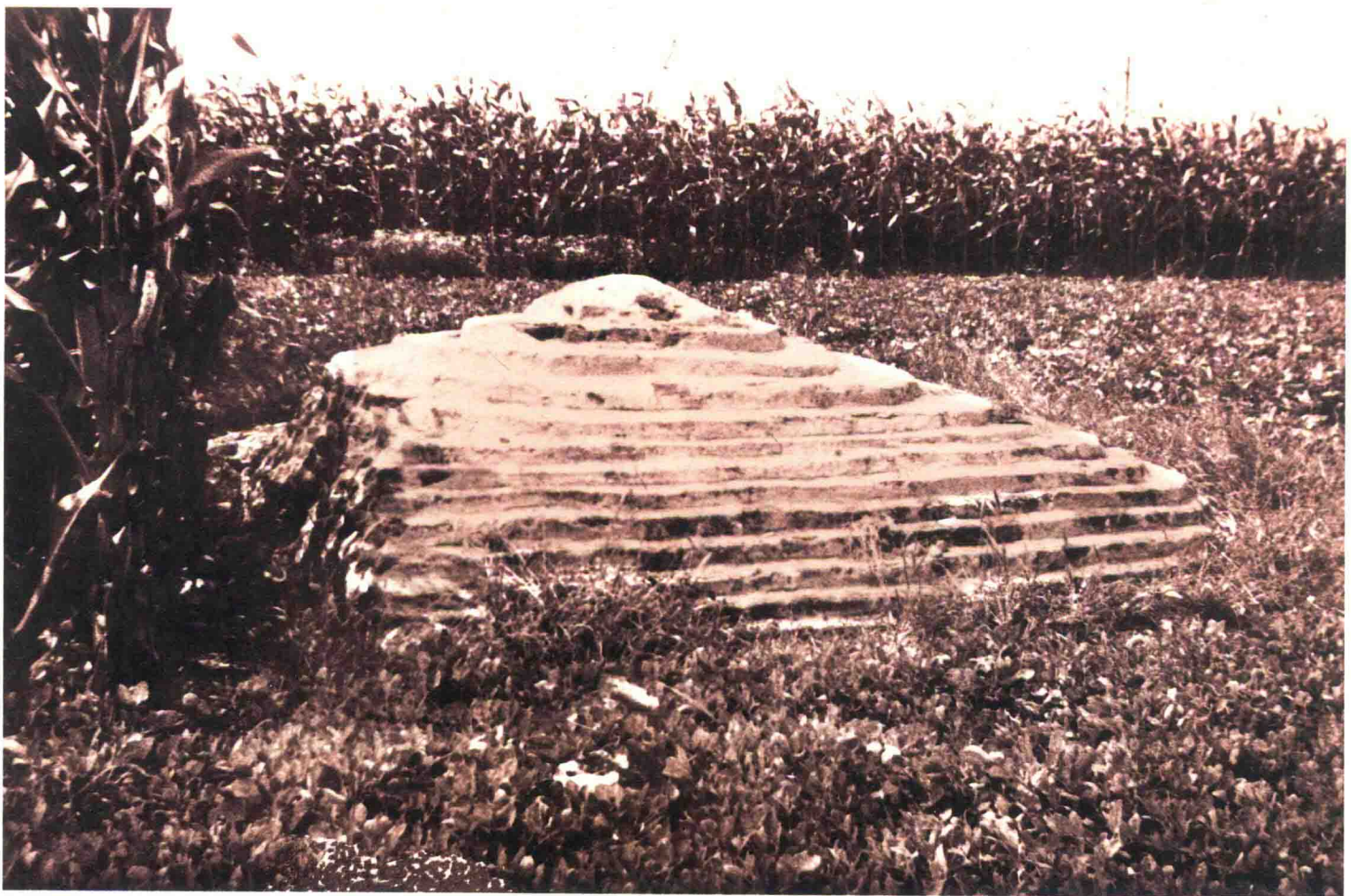
兩廣總督張人駿夫人與香港總督夫人合影（一九〇八年）



右起：張人駿 陳寶琛 朱益藩（民國初年於天津）



張人駿故居 天津湖北路一號（一九八七年攝）



張人駿墓 豐潤大齊坨（一九八九年攝）

高人自與山有素

三永五兄大人屬

老可為竹富真

張人駿



地氣殊異江
山炳靈則曷
由纂懿流光
若斯之盛者
矣真卿幸承
餘烈敢刻金
石而志之時
則六季夏四
月也

張人駿墨迹 麻姑山仙壇記臨本



蘇州桃花塢清末木版年畫《清代十帝像》

包括自順治至宣統清十帝、西太后及清末重臣十人像，共二十一人。上排左起：張人駿、趙爾巽、劉坤一、世續、載洵、袁世凱、瑞澂、盛宣懷。中排左起：乾隆、康熙、西太后、宣統、順治、光緒、咸豐。下排左起：道光、同治、李鴻章、張之洞、雍正、嘉慶。

目錄

序	谷同偉	一
序言	胡繩武	三
張人駿《府君家訓》		二一
張人駿《癸卯隨錄》		三〇五
張人駿《董氏族譜序》		三六八
張人駿印章		三六九
張人駿訃文		三七〇
張人駿簡譜	張守中	三七一
張人駿家族譜系表	張守中	三七四
張人駿家書日記發現簡介	張守中	三七六
張人駿信箋簡介	張守中	三八〇
讀《張人駿家書日記》	羅繼祖	三八三
張人駿傳略	艾力農	三八六
張人駿軼事	張象耆	三九二
張人駿家書日記人名表	張守中	三九六

序

張人駿（一八四六—一九二七年），河北豐潤人，字千里，號安圃。十八歲中舉，二十二歲同治戊辰科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一八九〇年四十四歲時，由京官外放，先後任廣西按察使，廣東、山東布政使。一九〇〇年任漕運總督。一九〇一年後，歷任山東、河南、廣東、山西巡撫。一九〇七年擢兩廣總督。一九〇九年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張人駿失守南京，避居青島。第一次世界大戰間，日德宣戰，日軍占領青島，乃舉家遷居天津。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卒於天津寓所，終年八十二歲。

張人駿歷經清同治、光緒、宣統三朝，官居一品，位列封疆。與大名鼎鼎的袁世凱是兒女親家。堂叔張佩綸是李鴻章的女婿，與其年齡相若，係晚清政壇「清流派」主將。其長子張允言，亦為進士出身，三品京官。

從目前所知分析，張人駿大致是一個慎獨、守舊、忠君、愛國的人。張人駿生前維持了一個在當時也已經少見的封建大家庭，而且持家甚嚴，不許納妾、使婢、賭博、抽大煙、唱堂會，因此張家衆多子孫中少有紈袴子弟。

張人駿與李鴻章、張之洞不同，他做實事，但似乎並不熱衷新政、洋務，對岑春煊、盛宣懷等人亦多所鄙夷。從限制後代人新學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他的觀念還是比較守舊的。

張人駿與袁世凱不同，張乃循吏，袁本梟雄。梟雄多權變，以滿足野心為目的；循吏多憂患，視忠君愛民為正途。

張人駿在兩廣總督任上，處理過一些重大涉外事件，如『梧州英輪事件』、『廣州二辰丸事件』，曾不惜以去就相爭，一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經嚴正交涉，與接任總督共同從日本人手中收回我東沙羣島。一九〇九年派水師提督李準率海軍赴西沙羣島視察，題名勒石，并在永興島升旗鳴炮，重申我國領土主權。這在積貧積弱的晚清，在遇夷務則一味敷衍退讓的腐朽官場中，誠屬難能可貴。

今人研究『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晚清，張人駿實在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人物。可惜的是，因《清史稿》『凡歿於辛

亥以後者皆不入傳』，張人駿事略未能見之於正史。另外，張家是一個大家庭，本應有大量的家庭檔案存世，因戰亂頻仍，『文革』抄沒，加之其長子張允言早逝，以至於零落星散，不知所終。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張允方舊宅發現了張人駿家書日記，其寫作年代大致在公元一九〇〇—一九一一年間。家書主要是張人駿寫給長子張允言的。家書、日記與一般公事和奏摺表達的意思可能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我們大抵可以看成是其內心的真實披露，且其內容多涉及當時官場高層許多重要的人和事，是研究清末歷史很有價值的史料。

張人駿的書法亦為當世和後人所推重，傅熹年先生評曰：『篆書圓勁，楷書沉穩，草書流暢』、『功力深厚，形意兼得』、『可與陳寶琛、吳大澂鼎足而三』。

張人駿後人敬祖愛鄉，今秋將張人駿家書、日記及張人駿生前所用印章慷慨捐獻河北省博物館。張守中先生是張人駿曾孫，調查家史近三十年，此次，一並將往日所集資料盡皆獻出。為了不辜負張氏後人的高風義舉，使這些資料盡快公布，為社會所共享，我們在一九九三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張人駿家書日記》一書基礎上，對釋文重新進行了校核補正（張金棟先生協助進行），並將張人駿全部八萬餘字手迹原件影印，同時增加了若干歷史舊照和相關研究文章，編輯成《晚清重臣——張人駿考略》一書付梓出版，希望對張人駿這個歷史人物以及晚清歷史的研究，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謹此，為序。

河北省博物館館長 谷同偉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序言

胡繩武^①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〇年底，我先後在文物出版社和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其間曾有機會接觸並熟悉了不少各省文物部門的同志。有一次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張守中同志，聽說我較熟悉的專業是中國近代史，就向我詢問關於張人駿的情況，並說自己是張的後裔。記得當時我們談到了張人駿和張佩綸的一些情況。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調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以後，張守中同志也曾幾次來看我。一次曾談及在北京張氏後裔宅中發現張人駿家書，我聽後很感興趣，當即表示張人駿身為清末封疆大吏，其家書可能有史料價值，希望能送交歷史博物館或加以整理發表。

一九八八年五月，張守中同志將整理好的《張人駿家書日記》八萬字的草書釋文抄本復印件送我，並談及近一年多來對張人駿相關材料作了進一步調查，擬將材料系統整理刊行發表，希望我寫一序言。目前，張人駿的這部家書日記未刊稿，經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這對史學界來說是件好事。我因得先讀釋文，特就其內容略作介紹於後。

家書日記的寫作年代，為清王朝統治的最後十二年間。當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整個社會處於迅速變化之中，重大的歷史事件層出不窮。在這期間，張人駿一直處在督撫大員的位置上^②。因此，家書日記的內容，不免涉及到當時許多重要的人和事，並從其封疆大吏的立場和保守的心態出發，有所評議。這些，無疑都是我們研究清末社會歷史的有價值史料。家書日記的內容較為龐雜。這裏，僅就其中涉及清末政局的若干重要問題，諸如清末『新政』、預備立憲、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加以說明，以便讀者見其梗概。

義和團反帝運動失敗後，清王朝爲了緩和人民對它的痛恨，早在一九〇一年正月，流亡西安的西太后就發出變法的上諭，聲稱『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從這時起，清廷在數年內，接連頒布一系列『上諭』，實行所謂『新政』。在政治方面：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爲外務部，裁河東道總督並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巡撫；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在軍事方面：裁汰制兵防勇，精選若干營分爲常備、巡警等軍；停武科試，設武備學堂；設練兵處，編練新軍；設立巡警部，舉辦警政。在經濟方面：設立商部；公布商會簡明章程，製訂獎勵公司章程，頒布商律及公司註冊試辦章程；派南洋華僑張振勛爲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辦閩、廣路礦事宜，勸誘華僑歸國投資，在京師設立勸工陳列所，設立高等實業學堂，設立戶部銀行。在文化教育方面：詔開經濟特科，廢科舉，令各省設立學堂；獎勵留學，進行留學生歸國考試，給予進士、舉人等出身，等等。

上述清廷所推行的新政，絕大部分有賴各地督撫的推行。如果從各地督撫的奏摺來看，幾乎無不表示贊成並認真推行的。可是，事實上，有些督撫實際上並不贊成，張人駿即爲其中的一個。張之所以對新政多持否定的態度，一是認爲新政多增加了財政開支，財政開支的增加，勢必增加對老百姓的搜括，由此將引起社會的動亂。二是他認爲有些新政，如練新軍與派留學的推行，增加了社會上的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的因素，將嚴重地威脅着清王朝的統治。例如，他在甲辰八月八日（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七日）的家書中就說：『近日諸如練兵之派，王公鐵良之查考，各省商部之欲派各省商局議員，此種舉動，似又欲踵庚子以前之轍，殊不可解。』在這封信中，他還批評趙爾巽對新政所採取的積極態度。他說：『趙次珊^③報毒^④太深，求新過甚，此番一入戶部，必不能十分安靜。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禍。即如近日各處辦理學堂，因籌學費而激成聚衆者不知凡幾。然僅恃尋常書院所入，豈能供學堂之靡費，而朝廷督促甚嚴，將來不知如何結局也。』

如果說張人駿的反對辦理學堂，是因爲害怕籌學費，增加搜括，激成聚衆，成土崩之禍，那麼，他反對派員留學，其着眼點則主要認爲輸入西學，將敗壞人心，引起革命了。一九〇七年端方電告他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巡撫恩銘的消息後，他在丁

未六月七日（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六日）的家書中說：『安徽一案，連得端午橋來電，大致已悉。日日言維新，日日言遊學，所得效驗如此。』另外，他在戊申三月初二日（一九〇八年四月二日）於兩廣總督任上主要談處理『二辰丸』事件的一封信中，再次談到赴日本留學之害時，說：『日本之於中國，無事不包藏禍心（中國貧弱自甲午始），而中外達官迷信崇奉，沉淪不返。一年數千萬流入東洋，所謂學成而返，好者不過目的影響數百新名詞，全無實際，否則革命、排滿、自由而已。而不惜以數千年聖賢授受之學，三百年祖宗創垂之典，盡棄所學而學焉，此固開闢至今未有之奇禍也。』

對於練新軍，張人駿同樣持否定的態度。丁未年四月二十二日（一九〇七年六月二日），他在河南巡撫任內的一封信中說：『會匪以河北為最多（去年春夏前尚未如此），大抵由上年秋操隨湖北軍隊（竟是南邊一派）闖入者。前已屢派人密查，匪首多在湖北、直隸兩省，行踪飄忽無定，來去不時，弋獲不易。本省雖多人會之人，而無大頭目，祇可漸漸設法，若操之過急，恐立生變動，轉難收拾。近來所獲匪徒，幾無一案非軍隊出身之人（曹州之匪多是袁軍舊部）。練兵之效如此，可嘆也。而陸軍部尚操更番排練之說，以為如此則可通國皆兵，我恐數年之後，將成通國皆匪，一旦揭竿而起，其禍恐不可收拾矣。』張人駿這裏所說的『會匪』，不知其所指者是社會上一般的會黨成員，還是指的革命黨人所組織的秘密革命組織的成員。但看來，他所指的是前者而非後者。從張上述的關於『會匪』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清末新軍的成分，會黨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張所說的河北、河南的『會匪』，『大抵由上年秋操隨湖北軍隊闖入者』，也有可能是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有意借秋操的機會，利用新軍中的會黨成員，把力量滲入到河北、河南。

正是由於張人駿對清廷推行新政是不贊成的，所以，他對推行新政多持消極態度，遇有困難，則設法活動調換工作地點，加以躲避。如一九〇五年他在山西巡撫任內，十一月十六日（公曆十二月十二日）從太原發出的信封家書中就說：『山西風氣尚未大開，官場能辦新政者，甚難其選。筱帥^⑤多病畏事，諸事皆成敷衍局面。如營務處止一知縣辦事，學務處止一本署文票兼辦……諸如此類，殊屬為難，若不調取人員，我一身萬難兼顧，故我意擬再頂奏，現先致函鹿、徐、榮三公^⑥商定，如皆以為不可，則開春以後，我祇可設法求退，數十年資望，不犯在山西丟人也。』在山西如此，後來到兩廣總督任上，碰到練新兵的困難時，他亦採取同樣的對策。他在戊申四月二十二日（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家書說：『粵省事太龐雜，無一事不艱難，雲階^⑦敷衍了事，玉山^⑧雜亂無章，尤以練兵最為不易。既無將才，又無酌款，而粵人又不肯守範圍。識

字者不能耐勞，不識字者又多蠻野。現雖徵集一協，而疾病逃亡無日無之。辦理之人無不疾首蹙額，欲思卸肩，將來斷無成效。』同時，在這封信中，他還說出了與陸軍部尚書鐵良之間的矛盾，并表示爲了避免新軍練成後，受到鐵良所派驗收人員的多方挑剔，他準備於『秋間托故引退』，免爲『若輩集矢』。

關於張人駿與鐵良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由於鐵良與袁世凱之間在爭奪陸軍控制權上存在着矛盾和爭鬥，鐵良把張人駿看成是袁世凱的人，故有意與張人駿作對。這一點，張人駿在上述那封家書中，已有所表露。他說，『鐵寶臣^⑨與汝^⑩本相熟，而我未與共過事，似無開罪於彼之理，乃處處爲難。前因購買槍炮，來電全無情理，誠不解其何心。……百思而不得其故，以彼與慰翁^⑪有隙而遷怒於我，抑以粵人抵制日貨而陸軍部之留學生欲爲倭人報復耶？』由此可見，鐵良與袁世凱之間，爭奪新建陸軍的控制權由來已久，無怪乎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鐵良與袁世凱之間鬥爭，繼續進行，直到清王朝覆滅爲止。

清末十年新政，在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曾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對這個問題，目前近代史學界尚無人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張人駿站在維護清王朝穩定的立場上，從保守的心態出發，對於興學校、派留學、練新軍等新政的推行，持否定的態度，從一個側面說明，清末的新政，在積累並培植最終埋葬清王朝的諸種社會因素方面，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

張人駿對於辦學校、派留學、練新軍持否定的態度，但由於清廷在一九〇五年正式停止了科舉考試，張爲其子女的前途計，還是接受了學堂的。這具體地表現在任山西巡撫期間，準備送他的兒子張允亮到傳教士李提摩太所創辦的山西大學堂西齋中去讀書。他說：『允亮中文已成，惜科舉已停，不能一試。若回北進學堂又諸多不便，且京中各學堂，課程風氣均不得法，山西大學堂西齋（中西兩齋，中齋重中學而科學不全），即李提摩太用賠款所創，教習皆係英人，課程雖無中文，而西學普通，似較他處全備。我意擬令桂寶^⑫入堂肆習（本有客籍，譬如往外洋遊學）不知可否？惟係巡撫之子，與本省人及屬員子弟雜居易招嫌謗，應否奏明辦理，汝見榮、鹿諸公試一商之，能多問當道最好，慰帥亦可。速速。如此事可行，則開正便可與新班同送也。』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辦大學堂是新鮮事，巡撫的兒子和當地人及其下屬人員的子弟一同入外國人辦的洋學堂讀書，亦爲前所未有的。張人駿不知這類事情『應否奏明辦理』，因此，要張允言找榮慶、鹿傳霖或袁世凱去聽取意見。這一方面表明，在封建專制時代，要去做舊制所沒有的事情是件大事；另一方面，也表明張人駿的謹慎。後來，由於張人駿由山西巡撫調爲河南巡撫，張允亮並沒有進山西大學堂，而是到北京入了譯學館，學習俄語。這一事實說明，隨着社會現實的

發展，張人駿的思想認識，在客觀現實面前，也逐漸有所變化。事實上，不僅張人駿如此，清末的其他一些督撫，儘管他們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立場，但在思想上和經濟活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張人駿把他做官所得，沒有再回鄉購買土地，而是去購買銀行的股票，即可為證。^⑬

一一

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清廷的頒布預備立憲上諭，是當時革命黨人策劃領導的武裝起義日趨頻繁，立憲派人要求實行君主立憲，用以抵制革命的爆發，挽救民族危亡的呼籲日益強烈，清朝政府為應付這個越來越駕馭不住的局勢的產物。

早在日俄戰爭期間，立憲派人就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報刊，製造實行君主立憲的輿論，言日勝是立憲之勝，俄敗是專制之敗，要求清廷儘快實行君主立憲，改革政治，以便挽救危亡，振興國家。在立憲派人強烈的要求下，清廷於一九〇五年秋派遣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考察憲政。他們考察的重點是日本和英國，都是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一九〇六年七月間，考察各國憲政的大臣先後回國。他們歸國後就上摺奏請宣布立憲，要求清廷『特降諭旨，期以五年，改行立憲政體。』『開館編輯大清帝國憲法，頒行天下。』^⑭八月十二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也奏稱：預備立憲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參與政務，為上議院基礎；使各州縣有名望的紳商參與地方政務，為地方自治基礎。八月十九日，端方、戴鴻慈等又面奏：憲法請仿日本，兵農工商請仿日、德兩國。

但當時，清廷內部對實行預備立憲的看法並不一致。不少人存心疑慮，公開持反對態度。他們主要擔心的有兩條，一條是怕『立憲有妨君主大權』，一條是怕『立憲利漢不利滿』。後來，由載澤又單獨上了一道密摺，說明君主立憲大意在於尊崇國體，鞏固君權，並無損之可言，並列舉日本憲法中規定的君主統治大權有十七條，請慈禧太后放心。他還針對所謂『滿漢之說』，指出宣布預備立憲，正是有利於滿族統治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請慈禧太后解除顧慮。

載澤是嘉慶皇帝的第五子惠親王綿愉的孫子，降襲為鎮國公，其妻是慈禧太后的親姪女（承恩公桂祥的女兒）。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哥哥，他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嫁給光緒皇帝，就是隆裕皇后；二女兒嫁給端郡王載漪，載漪之子就是曾被立為大